

回忆丁瑜先生片段

黄霞

2020年6月17日，获悉丁瑜先生已于前一日去世的噩耗，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蔼可亲的长辈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段时间，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198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我馆善本特藏部（古籍馆的前身）善本组工作。工作之初，在善本阅览室实习，有时也去善本总目办公室帮忙，当时帮忙打包邮寄全国各地的，正是油印本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丁先生是该书的主要编辑人员之一。后来因为工作岗位的缘故（长期从事馆藏新善本文献的采访编目，以及馆藏敦煌遗书的编辑整理），我与先生的联系不多。先生退休后，只是在每年春节组里与各位离退休老同志的聚会时能够见到他。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待人温和，为人低调，平易近人。

而我真正走近并熟悉先生，是通过后来几次难得的与丁先生一起工作的经历。2005年和2008年，我有幸在丁先生带领下，参与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老舍纪念馆、北京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等单位对部分革命历史文献藏品的文物定级工作。通过这几次与先生一起工作，使我不仅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更感受到先生对晚辈后学者的关爱。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准确严谨的分析方法，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这其中，尤以去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的工作经历记忆最为深刻。

2005年夏，丁先生带领赵洁敏老师和我，数次前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的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为该中心的部分革命历史文献做藏品文物定级。当时的工作流程是资料中心的老师们把要做定级的藏品分次分批拿出来，每次若干册，丁先生、赵老师和我分别传阅，阅后给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没有异议，藏品的定级意见就基本确定了。遇有不同看法时，丁先生会很平和地和我们一起讨论，最后统一意见，并不以长者和学问大压服别人。有些书丁先生一看就说有印象，说以前读过，甚至说出书的大致内容，大家都十分佩服先生惊人

的记忆力和渊博的学识。



2005年10月在老舍纪念馆门前合影（左起：黄霞、赵洁敏、丁瑜）

丁先生工作起来十分忘我，中间不休息，不喝水不去卫生间，一般都是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当时他已经七十九岁高龄了，又正值盛夏，大家都很担心他的身体，怕他累着，总是劝他多休息。每次先生都是满口答应，但只要一开始工作，他又把这些都忘脑后了。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所在的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个古色古香的院子，绿荫遮蔽，曲径通幽，环境宜人。那段时间，每天中午我们都与资料中心的老师们一起去食堂用餐，饭后我们仨一般会先在院子里散散步，然后到休息室休息。休息室里有沙发，赵老师和我让丁先生在沙发上躺着休息，可每次他都说坐着眯会儿就行。先生有时也和我们聊会儿天，我觉得与先生聊天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先生曾谈起他早年在北大读书和来我馆工作的经历，谈起他参与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工作经历，也曾谈到他的家庭。记得当时丁先生说他的夫人得了三叉神经痛，他经常陪老伴去医院扎针灸。从这件小事上不难看出他对夫人的关心，也体现了他们夫妻感情的深厚。他还说起他的孩子们，其中谈到在他的大儿子上小学时，丁先生曾带着他一起骑自行车去天津的经历，让我们听了既惊讶又佩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更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人。那时的公路还不像如今修得这么平整，他们骑行的也是普通的自行车，先生正是以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来锻炼孩子，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

2009年春节前，我与赵洁敏老师一起去丁先生家给先生拜年，我们给他带去了小礼品，离开时，先生执意要给我们每人一小盒茶叶作为回赠。在那之后，于每年的春节、中秋节前，我曾多次与部里、组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一起去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先生在年近九十高龄时，仍在坚持读书看报、写文章，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古籍事业的发展。每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在谈及某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仍是那样的思维敏捷，侃侃而谈。每次我们去看他，先生总是说麻烦你们了，当我们离开时，他都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口。后来几次先生年事已高，在我们的强烈劝阻下，他仍送到家门口，目送我们离开。

如今，丁瑜先生已驾鹤西游，但有关先生的这些往事，会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我会永远怀念他！

愿先生在天国一切安好！